

哈根贝克的“诱惑”： “全景式动物园”在中国

陈宇晗

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国海京伯马戏团在上海滩掀起了一波热潮，鲁迅当月在《黄祸》《野兽训练法》《火》等多篇杂文中反复提到该团的演出，还曾与许广平携周海婴前去参观。海京伯（现译为“哈根贝克”）家族长期从事马戏团、动物园等相关行业，马戏团团主洛伦兹·哈根贝克（Lorenz Hagenbeck）正是德国著名动物商人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的次子。

在动物园发展史上，卡尔·哈根贝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构想并实现的“全景”（panorama）式设计，以隐藏式壕沟取代动物园原有的铁栅栏，有效隔开参观者与猛兽。这样的设计迅速风靡全球，它标志着现代动物园设计的重大突破，甚至被誉为“哈根贝克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哈根贝克及其全景式动物园设计深刻影响了中国动物园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成为一代动物园从业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一、“哈根贝克革命”

卡尔·哈根贝克自幼便展现出对野生动物的独特热爱。十五岁时，他跟随父亲从事动物买卖并管理家中的动物园，六年后便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事业，并将其迅速扩大，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最大的动物贸易公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主要从事人种展示，开办了马戏团和一个正式的动物园，还研究动物心理与动物驯化方法。针对人与动物，

他有独到的见解：野兽和人的思想“是依照相同的设计而形成的，二者之间只存在程度的差别，而没有种类的不同”。基于此，哈根贝克在动物驯化中放弃了皮鞭和铁棒，试图以“柔驯”（gentling）的方式来教会其表演。这种理念投射至动物园领域，便是“全景式动物园”。

一八九六年，哈根贝克申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栅栏动物园设施的专利。他通过观察和计算各种动物的跳跃能力，挖掘隐藏式的壕沟以取代铁栅栏，因此这种构造也被称为“壕沟式动物园”。在哈根贝克的理念中，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通过“给动物们最大程度的自由”以提高动物的生活质量，而且“没有铁栅栏阻挡视线和提醒人们动物事实上被囚禁”，也会使观众拥有更好的体验感。

一九〇七年五月，位于德国汉堡斯特林根（Stellingen）的哈根贝克动物园（Tierpark Hagenbeck）正式开幕，哈根贝克终于将全景式动物园变为现实。园内的动物可以在限定区域内自由漫步，雕塑家和设计师还为它们用混凝土模拟了岩石，设计修建了山谷、山洞、湖泊、溪流、草地、悬崖、灌丛等多样景观，尽可能还原它们实际生活的环境。

在美国学者奈杰尔·罗斯福斯（Nigel Rothfels）看来，全景式动物园不仅意味着拆掉铁栅栏和挖掘壕沟，更重要的是所发展出的有关自由与幸福的叙事，动物园需要让公众相信，园中动物的生活境遇并没有那么糟糕。这种新式的动物园建设思想很快便风靡欧美，欧洲的罗马动物园、巴黎文森的新动物园，美国的丹佛动物园、圣路易斯动物园等都采用了哈根贝克最新的设计理念。全景式动物园被证实更符合观众的口味。

二、端戴考察团的不期而遇

对于中国动物园事业而言，清末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有着决定性意义。考察团成员两江总督端方和礼部尚书戴鸿慈回国后联合上奏，奏请“次第举办”包括万牲园（动物园）在内的“导民善法”。这一提议与二人此前在哈根贝克动物园参观的经历不无关联。

一九〇六年四月，端方、戴鸿慈一行来到德国汉堡。此前考察团曾

在伦敦、柏林等地参观了当地的动物园。不过，汉堡的动物园却对考察团有特别的吸引力。据负责接待的德国陪同人员记录，端方“一再表示”他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参观哈根贝克动物园。尽管该园尚未正式开放，在汉堡市政府的协调下，哈根贝克还是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考察团，并介绍了他所发明的全景式结构。实际参观的结果大大超出了考察团“所期望看到的”（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一九〇六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据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记载，考察团用半天的时间先后参观了园内的“校兽园”和“万牲园”。前者内有狮、熊、虎、狗等动物，“教之演习，驯扰可亲”；后者中“所畜珍禽异兽及鳞介各种甚众”。还特别提及，哈根贝克动物园“可代购发售”野生动物。或许正因此次参观，在次年为筹备北京万牲园购置动物时，端方选择由德国购买。

三、全景式动物园的引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动物园发展出现“小阳春”，各地动物园数量显著增多，又加之海京伯马戏团造访上海，引起热议，两股作用叠加，推动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关于西方动物园，尤其是哈根贝克动物园的介绍。一九三〇年，日本动物学者小泉丹撰写并出版了《动物园》一书，收录于岩波书店主办的“岩波讲座”系列丛书的生物学分册中。该书出版后不久，便由王式丹和马培文译为中文，分三期连载于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自然界》杂志。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又将其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结集出版。书中用大篇幅介绍了哈根贝克动物园的历史、设计理念，园中的布局、动物种类等。此外，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陈端志所编著《博物馆学通论》和马宗荣所著《社会教育事业十讲》中也有对哈根贝克动物园的具体描述。“动物园的设施与教育”被马宗荣列入其著作的第九讲。在他看来，哈根贝克动物园的特点在于“模拟动物产地之状态，以适宜于动物的生存”。可以说，随着动物园事业的发展，国人对全景式动物园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观察角度渐趋丰富。

在报刊方面，则出现了一批面向公众的关于哈根贝克动物园的介绍。北平的《新晨报附刊·日曜画报》、上海的《中华》等先后刊载多幅哈根贝克动物园的照片；健康知识类刊物《康健杂志》则以园内犀牛、斑马、长颈鹿等动物的图片说明哈根贝克动物园的设计，“对于一切豢养之动物，各为之造成适当之环境”，因此“所蓄各物，莫不活泼健壮，亦如其在生育之地然”。

同样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动物园经营者提出了引入和建设全景式动物园的构想。福建省立科学馆动物园占地仅四千平方米，却饲养了八十多种、近二百五十只动物。园长陈椿计划在扩建时参考各国动物园的发展趋势，修建“模仿自然”的动物园：撤除栅栏，修建壕沟，并对动物所在空间加以布置，“使其类似自然”。尽管陈椿只字未提“哈根贝克”或“德国”之类的字眼，但整个设计理念与全景式动物园并无二致。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Chester Zoo）创始人乔治·莫莎德（George Mottershead）的女儿琼·莫莎德（June Mottershead），在她撰写的《如何拥有属于自己的动物园》（*Our Zoo*）中写道，英国动物园从业者同样希望在自己的动物园中引入全景式结构。不过，从运营管理的视角审视，全景式结构所带来的挑战并非来自建设成本，恰恰相反，修建沟渠及相关设施反而比制造动物笼舍更为便宜，因为后者需要金属制品、刷漆和定时维护，并且有破损或生锈的风险，而是大部分动物园没有建造全景式结构的足够空间。为动物修建壕沟、布置自然环境所需的土地面积远比铁笼要大得多。这便成了很多动物园向往哈根贝克，但无法成为哈根贝克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的动物园存在同样的问题。附属于公园、民众教育馆、科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动物园大多地处城区中心，扩建难度极大，如果想要引入全景式结构，只能在城郊地区新建一座大型动物园，而这既需要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也依赖于所在地的人口基数与相关需求。

一九三三年，定址于南市文庙对面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初期，该园占地面积不足五千平方米，观众数量“日必数千”“动

辄逾万”，不仅使观众承受“拥挤不堪之苦”，狭小的笼舍和污浊的空气也让园中动物“备受种种生活不良影响”。作为动物园主任的沈祥瑞，深知面积对于现代动物园的重要意义。开园后，他多次呈请“扩充园地”，至上海沦陷前，市立动物园的面积已超过七千平方米，较初期面积增加近五成。由于文庙周边人口稠密，难以大幅扩建，一九三六年，沈祥瑞赴日考察学习归来后，向主管机关上海市教育局提交了在江湾的市中心区建设一座面积更大的动物园的设想。在他的计划中，这座动物园将与新设立的市政府相望，面积甚至有二十万平方米，其中的“棚舍设备”可“采用自然形式”。

沈祥瑞对全景式动物园的直观了解，应当来自他所考察的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一九二八年开幕的上野动物园北极熊馆，是日本最早的全景式、无栅栏动物舍。占地六百多平方米的场馆中仅饲养两只北极熊。在他撰写于考察期间的《动物园》一书中，特别比较了各国面积最大的动物园，表中显示，此时哈根贝克动物园的面积超过十八万平方米，是上野动物园的四倍有余，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建设一个超越哈根贝克的现代动物园。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相关计划再无实施可能。

四、全景式动物园的另类实现

抗战期间，中国动物园事业遭受重创，几近瘫痪，原有的动物园大多消失在枪林弹雨中。而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兴建了若干颇具规模的动物园，尤以位于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南岭的新京动植物园最为典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新京的西公园与白山公园均有小型动物园，新京市政当局决定将其合并为一座大型动植物园——新京动植物园，并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完成初期工程。整个园区占地面积巨大，超过七十万平方米，是上野动物园的二十倍之多。

在这座以成为“名实共符之东洋第一大动植物园”为目标的动植物园中，动物园和植物园不完全被区隔开，动物园内栽种有与动物种类和产地相适应的植物，植物温室内也饲养有动物，“使动植物浑然一体，

恰如在自然界生育状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新京动植物园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家将全景式结构付诸实践的动物园。该园声称，彻底“采取放养主义”，“不设栏栅”，使观众“得以观览动物的自然生活”。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其“在新京市这样广大新兴都市有广大的敷地”，并可搜集到除本土外，来自日本、蒙古国、泰国及台湾地区的动物。

在新京动植物园的设计和建设中，充当顾问的原上野生动物园园长古贺忠道为动植物园确立了“不要过于模仿日本动物园”的建设理念，换句话说，新京动植物园被赋予的意义是成为“远东的哈根贝克”。

在侵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动物园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涵。从仙台动物园调至新京动植物园任园长的中俣充志曾大谈动物园对“国家观念的涵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动物园作为“软性”的“社会文化设施”，既可以“补助教育”，也是“民族全体的唯一的娱乐慰安场所”，并可在“不言不语之间”，“使国民认识国都”。动物园在教育意图的表达上更为隐蔽，在侵略者的设计下，民众前往动物园参观娱乐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侵略思想的宣传和灌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京动植物园的后续工程陆续停建，并在战争末期沦为一片废墟。至此，欧美风行的全景式动物园在近代中国仅成昙花一现的历史片段。

哈根贝克的全景式动物园，不仅是空间设计的革新，更构成了一套关于驯化、观看与现代性的思想体系。这一动物园范式在中国的引入与变形，实则揭示了现代动物园作为一种文化装置（cultural apparatus）的深层逻辑：它不仅驯服动物，更重塑观众观看的方式，进而生产出一种关于文明与自然的现代叙事。哈根贝克及全景式动物园设计，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动物园的发展，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场全景式动物园的“未竟之梦”，既是技术与资源受限的结果，也映射出现代性移植过程中的矛盾与调和——一种既被哈根贝克“诱惑”，却始终难以“成为哈根贝克”的现代焦虑。